

庭审直播的进步与挑战

王琳

今日论语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众多舆论关注的大案要案在微博平台直播庭审,让公众在法庭之外也能迅速了解案件审理细节,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庭审微博直播,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

这种舆论氛围似曾相识。当年电视挤进传统媒体阵营成为“主流”之时,庭审现场直播也曾迎来过许多赞誉。但观众在对法庭的新鲜感过去之后,立即就厌倦了冗长而乏味的庭审直播。到今天,我们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庭审直播节目已屈指可数。

微博直播会不会重蹈电视直播的覆辙,没必要现在就下一个论断。但要看到微博直播契合了公众

的需要,又没有电视直播在时长、收视率等方面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微博直播并非“全部、全面、全景”式的同步直播,而是经过了人工的筛选和编辑。对于法院来说,它显得更为可控。这也为法院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微博直播的目的是什么?是司法宣传的新载体,还是以公开促公正的制度创新?

如我们所知,网络时代的司法危机,乃是一个世界议题。司法之所以具有权威,并不仅仅源于法官个人高超的职业素养。权力垄断、知识垄断、信息垄断,也是西方国家维系司法权威的不二法门。如今在网络的冲击下,这“三大垄断”正在消解。保守而神秘的司法系统也开始选择了有限的开放。

中国是在司法职业化刚刚起步

的转型期就遭遇了网络的凶猛,法院指导庭审的微博直播,更多像是舆论倒逼的被动应对。近年来,一些“死磕派律师”将庭审情况在微博上实时发布,掀起了阵阵舆论风暴,令不少身陷其中的法院头疼不已。就在去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还明确规定,“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显然,法院是想通过自己对庭审微博直播的掌控,来夺回已被部分律师“先占”的网络舆论场。

而对受众来说,谁在直播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直播的内容是否准确、有效,且能够充分满足公众

的知情权,进而便于公众及时行使监督权,以期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如果微博直播在审查过程中,自动过滤掉了不利于法院的负面消息,而只保留了看上去堂皇的正面内容。那么“以公开促公正”就无从谈起。因为需要监督的,恰恰就是负面的那部分,是法庭的审理瑕疵甚至违法。

借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求是》杂志上公开发表的一段文字,来对方兴未艾的庭审微博直播提个醒:“推进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有力举措。让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摒弃‘司法神秘主义’,全面落实司法公开原则。”庭审微博直播的制度指向,也只是由“公开”促公开,而不是由“占领”重夺话语权。

新民随笔

三老者说

季颖

上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上海老龄事业发展报告。一位代表发言时讲述了“三个老者的故事”。

“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逢年过节到小辈家吃饭,吃顿饭我马上就说要回家——我说的‘家’就是养老院。在我内心深处,已经把养老院作为一个家了。老人这番话,是对老龄工作的肯定。”

“一位年过90的老人说,我在养老院里享福,但我知道外面还等着400多个人进不来,我在想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分享这个幸福呢。老人这番话,是对老龄工作的期盼。”

“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我们在从事‘老伙伴’助老项目,由于招投标没有衔接好,致使半年没有推进,但需要帮助的老人是等不及的。老人这番话,是对老龄工作的批评。”

三个老者的肯定、期盼和批评,部分反映了养老的现状。上海各项改革建设事业,都需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但也许没有哪项事业,比为老服务更加紧迫。因为,其他事情还能以“年”为计时单位,唯独养老是以“月”甚至以“日”来计时,上了年纪的老人,实在等不起。

也有论者称,养老千头万绪,牵涉部门众多,获利空间较小,推进困难。的确,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需要从长计议,然而,在此进程中,是否可以针对具体问题来个“定点突破”,释放积极的信号?

比如,很多养老院苦于日常运营成本不断增加,难以为继。其实,国务院政策中有一条,养老机构用电、用水、用气、用热要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上海有这个条件,完全可以马上做,为养老机构“减负”。

比如,上海现有10万多张养老床位中,3万多张闲置,这些床位主要在郊区。一方面是市区养老院等候者多过“光明村”门口排队买鲜肉月饼的,另一方面是郊区养老院门可罗雀。这些闲置养老资源,有没有适当的倾斜政策把它盘活?

再比如养老责任,政府提供的是托底服务,不可能大包大揽,家庭和子女应承担主要责任。现在不少子女,推诿责任,把老人扔给政府,推给社会。因此,法院对侵害老年人权益的一些案件,能否从快、从简办理,形成全社会尊重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氛围。同时也通过这些案例,唤醒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意识。

“温情返航”不能让规则成为代价

新民网论

日前,陈静正在杭州出差,突然接到长沙家中女儿和婆婆出车祸的消息,当她赶到萧山机场时,已错过了最后一班杭州直飞长沙的班机。绝望无助之际,不料机场叫回了班机。

与明星大腕、达官贵人延误飞机招致口诛笔伐不同,为一个普通人的返航获得了很多人的赞扬。但拨开温暖、陶醉的面纱,我们还要看到这次返航的巨大社会成本:最直接的就是燃油消耗;另外,晚点整整一小时,虽然获得了其他旅客的同意,然而133名乘客、7个部门为一个人返航,成本未免太大。

“温情返航”释放出危险的信号。航空飞行属于特殊运输,有着诸多禁忌。一系列明确、严格的管理制度,才是飞行安全的根本保证。一旦轻易打破,后果不堪设想。延误班机的旅客都有特殊理由,照顾了陈静,对下一个旅客是否公平?倘若特殊情况就可以打破规则,群起效尤,混乱场景不敢想象。

权贵阶层也好,平民百姓也罢,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公平正义的基石。因为“弱势”而随意放行和因为权贵而刻意媚迎,本质上并无不同。

故而,在制度设计时,应该为

特殊的情况留下空间,但一旦规则已经制定,身份、温情等等都不是破坏规则的理由。“返航特例”,

当下不为例。
(凌寒,全文刊新民网,网址 www.xinmin.cn)



“80后”小夫妻不下厨



去婆家吃吃,到娘家蹭蹭,叫外卖混混,等朋友聚聚。

郑辛遥

自由谭

提笔忘字,似乎正在成为不可回避的集体尴尬。汉字听写,成年人不如在校生,大学生不如中学生。而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发起的调查显示,98.8%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曾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除了提笔忘字,还有落笔错字,以及书写难看。汉字,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甚至有人惊呼,我们已经成为电脑时代的新文盲。

提笔忘字,“罪魁祸首”是键盘。正如有人调侃的,我们不应该再自称“笔者”,而应该自称“键人”。久不见,必然陌生;久不写,难免生手。前不久,某档电视节目测试,十个人中居然有九个不知道“熨帖”、七个不会写“癞蛤蟆”……

有人把提笔忘字称之为“汉字危机”,认为会“塌了文化的根基”,因为汉字是传承民族文化最重要的

提笔忘字会不会落笔错字?

王石川

载体。其实,不必大惊失色,在键盘时代,提笔忘字是一种挡也挡不住的必然。快节奏的生活,高效率的要求,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放弃电脑,拒绝键盘打字,而重新选择笔墨纸砚。

时代变了,书写的工具和方式也在变。甲骨文、金文时代,刻刀是主要工具,骨器、铜器是介质,铸刻是主要书写方式;在篆书、隶书到楷书的演进过程中,软笔成为主要工具,简册、丝帛和纸张相继成为介质,软笔书法成为书写方式,而铸刻演化成一门艺术;近代,硬笔逐渐取代软笔成为书写工具,纸张成为主要介质,软笔书法成为艺术。网络时代,我们更多地使用键盘、软件、屏幕,纸笔的使用率逐渐降低,或许将

来优美的硬笔书法也能成为一种才艺,而我们书写所用的文字,仍然是汉字。无论怎么写,汉字仍然在那里,既然有了更便捷、更节省的方式,何必弃简从繁?

当然,需要厘清一个概念,无论书写的工具和方式怎么变,都不应该忘记汉字怎么写,都不能把汉字写错,更不应该为自己写错字寻找笨拙的借口。如果说提笔忘字是一件尴尬的事,落笔错字就是一件丢人的事。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名人喜欢题字,却不时闹出笑话,书法功力如何先不谈,光一幅字里频见错别字就让人笑掉大牙了。一个人再饱学,如果动不动就读错字或写错字,也不值得称道。

提笔忘字,并不只是出现在我国,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包括日本、韩国也很常见。据报道,美国学者杰茜卡·贝内甚至把电脑称为“手写体的诅咒”。面对书写能力的下降,其他国家也在想办法。我们该怎么办?有学者提出了三种途径,一是重视书法课;二是增加汉字源流课,即让学生了解汉字的起源和演变,从而感受到汉字生动有趣;三是诠释汉字的内涵美,比如通过“推、敲”的故事、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等典故,让学生体会汉字的字义之美。无论哪种方式,提高汉字书写能力都不是一日之功,最关键的是需要时常动手。即便不能写一手好字,也不应该落笔错字。

新民新语

38位市民

孙佳音

到访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约是不可错过的。从1880年建在中央公园边缘那栋简朴的大楼,逐渐扩展成繁华的第五大道上沿街而立的13万平方米的艺术殿堂;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几乎跨越人类所有文明和时期的300余万件艺术珍宝——大都会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雄心、公民责任和慷慨付出的故事:它来自于1866年7月4日巴黎的一次午餐,借鉴于欧洲皇室赞助了数个世纪的欧洲博物馆,出生纽约的著名律师约翰·杰伊在那一天宣布,美国需要自己的艺术博物馆,当天在场的一批美国同胞誓言要共同为之奋斗。正是这38位纽约市民的努力,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四年后成为了现实。

由于资金有限,博物馆早期在为大众提供艺术品欣赏时常常提供的并不是艺术品原件,只能将大量精力集中在累积世界名作的电铸版和石膏模型上。100年前的“石膏像大厅”码放凌乱、寒酸十足,甚至总数超过两万六千件的石膏模型如今还被安置在博物馆中世纪雕塑厅和相邻的两个展厅内。但经过它们身边的时候,并未觉得荒诞和山寨,甚至不由得升腾起敬意来,相比河北某座博物馆里那些宏大而极具独创性的瓷器,这些石膏模型承载了一个“由公民而建,并且为公民而建”的博物馆的光荣历程。

现任馆长坎贝尔说,“若无对藏品的理解和诠释,我们就和一间托管保护珍宝的仓库并无二致”。的确如此。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他们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叙利亚搬来了大马士革房间,不仅有绚丽的大理石地板,还把前厅处一座充满伊斯兰风情的喷泉也一起搬到了纽约,叫人叹服;为了更好地描述异域,阿斯特邀请27位中国工匠花费五个月时间,以苏州网师园为原型建起的静谧庭院,几案圈椅、湖石翠竹、飞檐灰砖,满是中国文化的空灵秀美,叫人感念;只因为持续的考古和研究,埃及政府便将整座2460年前的丹泽神庙慷慨赠与,如今它作为镇馆之宝被安置在馆内专建的玻璃大厅中。

“通过展现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来教育和激励大众”,这是那38位纽约市民当初为大都会博物馆定下的使命。我想他们的后人已经做到了。而我们的博物馆呢?